

敦煌何以成为“华戎所交一都会”

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，又是中西贸易桥梁，多方位、广渠道地吸纳古代印度文明、希腊、罗马文明、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。这种多元文化的共存、共生和共荣，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。

日前，习近平总书记前往莫高窟考察调研。他走进洞窟，仔细观赏千年的敦煌壁画和彩塑，又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贵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，还与专家学者、文化单位代表座谈。

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给予肯定，指出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、融汇的结果，强调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，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，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。

这一重要讲话，高度概括了敦煌文物蕴含的多元文化价值，肯定了敦煌文化对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启示意义，值得认真学习领会。

四大文化汇流之地

季羨林先生认为，世界上历史悠久、地域广阔、自成体系、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：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，再没有第五个；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，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，再没有第二个。

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。自张骞凿空西域后，便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。它既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，也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关口。从这里西行，经现在的新疆地区，再西逾帕米尔高原，可达中亚、西亚、南亚；东行可经河西走廊，抵达长安或洛阳。

敦煌的阳关和玉门关曾是中国与世界开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关口。西方的商品从这里输入中国，中国的货物从这里流向西方。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繁盛，胡商频繁出入或留居敦煌，使敦煌成为“华戎所交一都会”。

敦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和中转站。中原的丝绸和瓷器，西方的金银器、宝石、香料、药材、高档织物，北方的驼马等，都汇聚于此，并通过胡商和汉商的交易流向东西方。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波斯银币，正是公元5世纪的流通货币。

东来的胡商中，以粟特人最为有名。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，其民族善于经商，足迹遍布欧亚大陆，起到了东西方物质、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介作用。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，出土过一份公元4世纪的粟特文书信。它是一份粟特商人写给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主人

和亲属的。信中说，由于洛阳被匈奴人烧毁，他们正在敦煌、酒泉、武威一带经商。

敦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。每逢中原王朝对西域用兵，都会把敦煌、酒泉作为军队的集结地和出发地。敦煌还承担军用物资、粮草的供应和转运任务。有时，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也设在敦煌，如东汉的护西域副校尉等。

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敦煌曾成为抗击柔然、突厥、回鹘等的前沿阵地。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，唐朝进一步加强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，在玉门设立玉门军，在沙州城内设立豆卢军，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（今若羌）和播仙镇（今且末）划归沙州管辖，使得敦煌再度成为边防重镇。

中原王朝对敦煌和西域的大力经营，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。很多国家的使节经敦煌去长安或洛阳。据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记载，敦煌曾接待安息大月氏、康居、大宛、罽宾、龟兹、于阗等29国使节。另外，一些西域国家还将本国王子作为政治人质留住敦煌。

源于敦煌与西方诸国的频繁交往，敦煌藏经洞里留存了相当数量的古代民族文字写本，如于阗文、龟兹文、粟特文、吐火罗文、突厥文、梵文、希伯来文等。

地理上，敦煌的南北两面都是山脉。南面是祁连山，再往南是青藏高原；北面是马鬃山，再往北是蒙古草原。

我们知道，青藏高原先后居住过羌、吐谷浑和吐蕃等民族，蒙古草原则更是多民族繁衍和争战的舞台，相继有匈奴、鲜卑、柔然、敕勒、突厥、回鹘、党项、蒙古等驰骋于此。这些民族的兴衰成败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敦煌。例如，卢水胡人（北凉）、鲜卑（北魏）、吐蕃、回鹘、党项（西夏）、蒙古（元）等都统治过敦煌。以吐蕃政权为例，他们统治敦煌长达60年，对敦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由于少数民族长期活跃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，因而敦煌民众中大量出现少数民族姓氏。敦煌藏经洞留存的古藏文、回鹘文、西夏文、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写本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版、回鹘文活字印刷本等，都是鲜活的历史遗

证。

敦煌石窟现在还有一定数量的鲜卑人、吐蕃人、回鹘人、党项人和蒙古人的供养人画像。这说明，他们曾为敦煌石窟的营建事业作出过积极贡献。他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，对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服饰史也提供了形象的图像资料。

宗教文化共存之地

历史上，敦煌始终以开放的胸襟，吸纳东西方的各种宗教文化。除了佛教，中国本土生长的道教广为传布，外来的祆教、景教和摩尼教等也随着商贸的往来和众多僧侣的西行、东游而兴盛。多样宗教的传入，不仅促进了敦煌文化的发展，也改变了敦煌的文化格局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、佛教文化为实体、其他宗教文化为衬托的信仰模式。

第一，传统汉文化是根基。

秦汉时期，敦煌先后居住乌孙、月氏和匈奴等少数民族部落。至汉武帝时，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，并在河西设立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。由于中原王朝不断向河西移民，使这一地区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结构。

随着中原王朝对敦煌和河西走廊的经营，使其建立起深厚的汉晋文化根基，并培育出一批著名的儒家学者。他们或著书立说，或设馆授徒，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事迹。

隋唐以来，随着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，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在敦煌扎根、繁衍。在这个交汇中国、希腊、印度、中亚、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，汉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。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，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。

第二，佛教是“心灵鸡汤”。

佛教诞生于南亚大陆，传入敦煌的时间很早。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里，就有关于“小浮屠里”的记载。浮屠是佛塔、佛教寺院之意。由此可见，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已传入敦煌。

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的高僧，进一步促进了佛法的东传与流布。像有“敦煌菩萨”之称的竺法兰，带领弟子在敦煌译经、传教；沿丝

路东来传教的高僧还有安世高、迦叶摩腾、竺法兰、支娄迦谶、支谦、康僧会、鸠摩罗什等；西行求法的高僧有朱士行、法显、宋云、玄奘等，他们都是经敦煌前往西域、中亚、印度。

在敦煌石窟的一些洞窟中，记载有西行求法名僧刘萨诃、赴西天取经的唐玄奘以及东来传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、康僧会、佛图澄等人的故事和事迹。这些来往于丝路的高僧，不仅随身带来丰硕的佛教典籍，而且在敦煌和内地潜心翻译。他们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流行。

至隋唐五代宋，佛教日益成为敦煌民众的主流文化。这一时期，在帝王将相和地方官员的推崇、倡导下，佛教得到空前发展。由此，敦煌一地的寺院和僧尼人数大大增加，而且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
史料记载，敦煌的僧俗庶民不仅热衷投身于各种佛事活动、积极举办各类斋会，而且醉心于抄经、写经、转经、建窟、修塔、造幡等功德事业。这一时期，敦煌民众在莫高窟兴建和重修了数百个洞窟。

第三，祆教、景教和摩尼教异彩纷呈。

祆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6至5世纪创立。后来，沿丝路传入敦煌。该教在敦煌的传播与粟特人密不可分，因为他们多信奉此教。有唐一代，敦煌还形成了粟特人的族聚乡——从化乡。

在晚唐五代宋的敦煌文献中，还会经常看到康、安、石等昭武九姓人，其中一些人在归义军府衙中担任要职。可见，在隋唐五代宋，敦煌还定居着大量的粟特人。

粟特人在敦煌城东修建袄祠，以从事宗教活动。后来，随着敦煌粟特聚落的消亡，袄教开始同中国的传统礼仪、民间信仰相融合。例如，在当地官府祈雨的祭祀、除夕的大摊礼及赛袄活动中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。

景教是古代基督教中的一支聂斯托利派。敦煌藏经洞出土了7件有关景教的文书。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还发现了一幅景教画像。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所创。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有关摩尼教的文书。

多样艺术交融之地

敦煌既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，又是中西贸易的集散地、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。敦煌石窟就是在这种东西文明碰撞、交融背景下创建的。

一方面，秉承汉晋文化传统，

广受中原文化影响，呈现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；另一方面，凭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座桥梁，多方位、广渠道地吸纳古代印度文明、希腊、罗马文明、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因素。这种多元文化的共存、共生和共荣，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。

敦煌壁画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。就建筑形制而言，早期的禅窟和中心柱窟分别受印度“毗河罗窟”“支提窟”的影响；早期的彩塑，如佛、菩萨、弟子等的造型和服饰，受到印度马图拉、犍陀罗佛教艺术造像的影响；中、晚期壁画里，有印度经过吐蕃传来的密教内容。

总体来说，敦煌早期壁画艺术受印度马图拉、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较大；中、晚期壁画艺术多受笈多、波罗王朝佛教艺术风格影响。其中，最为知名的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，之后连续开凿千年不止，堪称规模宏大、内容丰富、艺术精美，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。

敦煌壁画中的外来元素俯拾即是。有穿戴中亚、西亚、东亚、南亚等各式衣冠服饰的人物；有来自中亚、波斯的青金石、胡粉、密陀僧等颜料；有联珠狩猎纹、联珠对兽纹、联珠对鸟纹等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图像；有来自西亚和地中海的透明玻璃器图像，有波斯特征的金银器；有西域胡床以及西来的腰鼓、羯鼓、箜篌、琵琶、海螺、篳篥、胡琴等乐器图像；有中亚流行的弧旋舞图像等；还有受希腊、波斯、印度和中亚等艺术影响的日神、月神图像。

相关外来文化元素，大多起源于地中海的埃及、希腊、罗马和波斯。后沿丝绸之路东进，在所经之处，又与当地文化融合后继续东传至敦煌。

敦煌佛教艺术在不断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同时，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。千百年间，孕育和创造出了富于中国精神和民族气派的艺术。其中，敦煌三十多类经变画是典型代表。它们是中国对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传承下的创新品。这些经变画对日本、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总之，敦煌石窟是汇聚多种文明的宝库。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吸纳、消化外来多元文化并不断创新、发展的典范。当下，大力挖掘和弘扬敦煌文化，服务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已成为时代召唤。

（文/陈菊霞 来源：《解放日报》）

东晋的“逃婚驸马”

东晋年间，晋成帝司马衍给小姑姑寻阳公主选定了一门亲事，准驸马是他的发小，汉末曹操谋士荀彧的六世孙荀羨。荀羨时年十五岁，家世、相貌、才学、人品样样配得上寻阳公主。

消息传出后，荀羨立马成为全国所有适婚男青年羡慕的对象。

然而，这么天大的馅饼掉下来，荀羨却不愿接。圣旨颁布后，荀羨居然收拾包袱，连夜撒丫子跑了！

荀羨并不是没脑子的二货，相反他是个智商、情商高度发达的狠角色，从小胆子就比较肥。苏峻之乱时，荀羨才七岁。当时，小皇帝

晋成帝司马衍被逼迁居石头城，被软禁在一间仓库里，受尽苏峻的凌辱。荀羨的父亲荀崧带着全家老小陪皇伴驾。

苏峻对鬼灵精的小荀羨很是喜欢，经常把他抱在膝盖上逗着玩。荀羨年纪虽小，却识大体，更有忠君爱国思想，回到家后对他妈妈说：“苏峻太不要脸了，给我一把刀子，我把他宰了！”荀妈妈自然不会给他刀子，但荀羨这份早熟的心意与胆色，却让人钦佩。

这胆大包天的二货长大后，居然敢逃婚，而且对象是皇帝的姑姑，这让晋成帝的面子往哪搁！上

级没面子，手下自然想尽办法为上级找回面子。在地毯式搜索下，荀羨被抓住。跑也跑了，反对也反对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俗套了，荀羨乖乖认命，娶了寻阳公主，也从此走上了国家公务员的康庄大道。

荀羨因何逃婚，我们无从得知。我们更加无从得知，以后的岁月里，荀羨是否会抹一把冷汗，心有余悸地说，幸好当初逃婚没有成功，不然哪来的仕途畅达、官运亨通。等到荀羨担任北中郎将、徐州刺史、监徐兖二州及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假节等一大串官职时，仅仅二十八岁，刷新了东晋官场一系列

官员任职最年轻纪录，简直羡煞旁人！

荀羨也因此成为很多人人口中“传奇”。很多年之后，老牌贵族世家陈郡谢氏的谢晦刚当上荆州刺史时，到处嘚瑟，恨不得广而告之天下人。一次，谢晦跟堂叔谢澹聊天，期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谢澹也腹黑，故意问他说：“你今年多大啦？”谢晦矜持地答道：“三十有五。”谢澹笑话他说：“想当年，人家荀中郎（荀羨）当北府都督时，才二十七岁，你跟人家比起来，啧啧，简直老得不像话。”谢晦一时无地自容。

这样看来，荀羨多少要托身为

驸马爷的福气了，尽管他确实很有才华和眼力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永和六年（350年），司徒蔡谟因事获罪，执掌朝政的殷浩打算判处他死刑，咨询荀羨的意见。荀羨阻止说：“打住，如果你今天杀了老蔡，明天就会出现当初齐桓公、晋文公那般兴师问罪的事情。”荀羨这是在暗示殷浩，要是你杀了蔡谟，桓温岂能善罢甘休，肯定会借题发挥，举兵造反。殷浩惊出一身冷汗，当即将蔡谟死刑改作剥夺贵族身份终身。

荀羨病逝时，年仅三十八岁。晋穆帝司马聃很难过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荀羨、王导相继去世，以后朕有疑难还能靠谁呢？”

（文/陈甲取 来源：《羊城晚报》）